

模因论视角下《论语》的英译研究

翟晨苗,王立松

(天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论语》是儒家著作经典,蕴含了孔子思想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2500年来,儒家学说对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的英译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众多中西译者都为《论语》的英译投入了大量心血。本文选取中西方典型译者的典型译本,结合文化进化的理论——模因论,综合考虑译者的身份、动机及所处历史阶段,结合具体译文探讨《论语》英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论语》翻译的整体趋势。

[关键词]《论语》;孔子;文化传播;模因论;《论语》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7)04-0093-04

一、模因及模因论

模因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随着近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模因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模因这一概念最早由牛津大学教授 Richard Dawkins 在他的著作 *The Selfish Gene* 中提出,由基因(gene)一词仿造而来。他认为,正如基因的复制与竞争从而促进生物进化一样,文化中也存在这样的单位,靠模仿和传播生存,将一些思想观念等文化因素传播开来,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从一代人延伸到下一代人,这一单位便是模因。

1997年,Andrew Chesterman 出版了 *Memes of Translation*,第一次将模因论引入翻译研究当中,他还提倡把翻译研究作为模因论的一个分支,把翻译本身及翻译理论当作模因。他认为翻译的历史就是翻译模因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模因都复制并继承了上一模因,同时也经历了变异,模因的复制因子不是简单复制并转移了原模因的内容,也会有所增改。

模因的生命周期分为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四个阶段。首先,模因被个体关注并存储在记忆之中,这一个体就是宿主,宿主之后将其提取出来

用于表达和交流,使信息内容借助一定的载体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的过程。模因论旨在研究文化传播和文化进化,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现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因此模因论和翻译,尤其是和文化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论语》的影响力及英译状况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是最具影响力的儒家作品之一,因其平实的语言以及深刻的寓意而闻名于世。《论语》中的很多说法都已变成生活中常见的格言警句而广泛流传,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政治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几乎包含了儒家学说所有的基本概念,如“仁”“礼”“孝”“德”“义”“道”“和”“天命”“中庸”“君子”“小人”等。《论语》面世后的两千五百年间,在塑造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传统价值取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语》的地位无与伦比,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曾说《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即使是在当今中国,《论语》中蕴含的智慧仍规范着人们在社会治理、人际交往、文化教育中的行为。自16世纪末利玛窦将《论语》译为拉丁文以来,《论语》的翻译和研究

[收稿日期]2017-06-20

[作者简介]翟晨苗(1994-),女,河南濮阳人,主要从事语言与文学翻译研究。

就从未间断。在不同时代,人们对《论语》有着不同的解读,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读者对《论语》也有不同的解读,这就使得《论语》的译本各具特色。译者身份不一,所处年代各有特点,他们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动机,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三、模因论视角下《论语》不同译本的分析

根据模因论,一国的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模因或是一个模因库。按照这种观点,英语国家的文化可看作是一个模因库,其中一些模因相互结合、共同传播,形成了模因复合体,如古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等。^[1]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外一个模因库,存在许多模因复合体,如孔子思想、道教、佛教等,每个模因复合体中都含有许多模因,如孔子思想中就含有“礼”“德”“天命”等模因。《论语》是承载着这些模因的载体,这些模因深深植根在中国宿主的大脑中,通过交流、教育等手段被传递给下一代。为了感染更多外国宿主,译者将这些模因译为英文在西方世界传播。因此,《论语》的英译过程也是儒学模因在西方世界传播的过程。根据译者身份和动机以及不同的翻译价值取向,《论语》的英译本主要分为四类:西方传教士的译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海外华人的译本以及国内译者的译本。下文将从模因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论语》英译文本进行详细分析。

1. 西方传教士的译本

西方传教士是第一批将《论语》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人,儒学模因从此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基督教义占据统治地位。西方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论语》包含的儒学模因对他们来说可谓既新奇又陌生。因此这些模因能否成功传播主要依赖于模因自身能否受到这些西方宿主的注意。如果西方宿主不能注意、理解并接受这些模因,那么这些模因的传播便在同化阶段就终结了。《圣经》中的基督教文化是西方宿主认知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模因复合体,儒家模因必须与基督教或西方哲学中这些占中心位置的模因结合,组成新的模因复合体,才能感染新的宿主。^[2]这时《论语》英译便成为了传教士传教的工具,他们试图在传统中国典籍中寻找证据来证明基督教义中所谓的“普世真理”。这些翻译动机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翻译中倾向于使用归化的策略。

James Legge 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1858年在

英国商人的赞助下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他把翻译《论语》作为自己宗教生涯的一部分,以此达到传教目的。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要向数以百万的中国人民传递基督教义,要达到这一效果,我必须能够用一种像他们自身语言的语言说话和写作。”理雅各的《论语》译例如下:

(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3]

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 —— 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 (Legge, 1960: 220 - 221)^[4]

“命”是儒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儒家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与“天命”表示“天赏善罚恶的意志”不同,“命”通常表示承受者必须面对的无可奈何、不可抗拒的结局,具有无意志、无目的、无规律、无善恶的特征,是人的有限性的反映^[5]。理雅各把“命”译为“appointments of Heaven”,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帝的选择与任命,是他对人之宿命的理解,属于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范畴。Legge 用这样的方法使儒学模因和西方宗教模因联系在一起,弱化了英语读者对其译本的陌生感,因此这些模因更容易引起潜在宿主的注意并被他们接受,进而得到复制和传播。

另一位传教士 William E. Soothill 的译文也体现了这一特点。Soothill 是一位英国清教徒的传教士,非常尊重儒家学说,他曾在其《论语》译作的序言中称道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君子,自己常常被孔子睿智的话语吸引。同时,他也利用儒家学说宣传基督教。其译例如下:

(2)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3]

The Master speaking of Chung Kung said: “If the offspring of a brindled ox be ruddy and clean-horned, although men may not wish to use it, would 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 reject it?” (Soothill, 1937: 145)^[6]

这里的“山川”指“山川之神”,Soothill 将其翻译为“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他用“gods”来表述中国文化中的一切精神力量,是将中国文化西方化的直接体现。在他的翻译中类似的现象有很多,如把“帝”或“神”译为“god”,因为在西方世界中 god 是造物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Soothill 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使新颖又陌生的儒学模因易被英语读者接受。

2. 西方汉学家的译本

20世纪西方传教士为《论语》英译揭开序幕后,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家开始翻译《论语》。与传教士不同的是,汉学家的翻译开始注重《论语》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文化蕴意。这里主要讨论 Arthur Waley 的译文。

20世纪上半叶,汉学家 Arthur Waley 开始将汉语中蕴含的丰富文化词语引入英语世界,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其译本中,往往试图保留《论语》的原始内容,所以他更关注翻译的细节。他的目标读者是不懂汉语的西方读者,他要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的原貌。其译例如下:

(3)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3]

Tzu - lu asked how one should serve ghosts and spirits. The Master said: “Till you have learnt to serve men, how can you serve ghosts?” Tzu - lu ventured upon a question about the dead. The Master said, “Till you know about the living, how are you to know about the dead?”^[7]

中华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一般将其称为“鬼”或“神”。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这种超越一切的使人敬畏的力量,他们称其为“上帝”。这两种力量的本质是否相同尚未有定论。Waley 把鬼神译为“ghosts and spirits”(他还把“上下神祇”翻译为“the sky—spirits above and the earth—spirits below”),而不是直接把鬼神译为 God,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力图把儒学模因“鬼神”传播到西方世界中去。

3. 海外华人的译本

近现代以来,受政治、宗教立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一些西方译者在翻译《论语》时,时常带有某种偏见,使得中国的形象在欧洲被歪曲,引起了一些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们,尤其是国外留学生的不满。^[8]为了扭转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捍卫儒家学说的地位,辜鸿铭进行了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为英文的这一伟大工程,一改《论语》英译一直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控制的形势。辜鸿铭是英译《论语》的中华第一人,他出生于马来西亚,年少时曾游历英、德、法等国,并以优异的成绩

取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故而对西方文化也有深刻的理解。在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中,他几乎删去了所有的地名和除孔子以外的人名,以此来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感。此外,他还善于加注,引用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的作家及思想家的话来解释《论语》,增进了读者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如:

(4)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3]

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 put the same question to Confucius as his father did, Confucius answered: “think how anxious your parents are when you are sick, and you will know your duty towards them.”^[9]

在辜鸿铭的译文中,孟武伯被译为“a son”,译者没有向读者介绍孟武伯的相关内容,而是直接略去这一内容,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难度。在辜鸿铭的翻译中,孔子弟子的名字多被翻译为“a disciple”,读者因此不必为中文名字去纠结。与英语文化中已经存在的模因相比,这些人名模因对英语读者并不重要,所以辜鸿铭选择了忽略的策略。这一做法虽然对一些儒学模因的传播有一定消极影响,但是从更加全面性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使得更核心更重要的模因能够更好地传递。

4. 20世纪末以来国内译者的译本

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学者开始英译中国典籍,他们的翻译行为给《论语》翻译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些翻译家大多数在中国出生成长,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们英语语言功底深厚,其英译中国典籍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舞台。在这里我们谨选取许渊冲教授的《论语》译本加以讨论。

许渊冲是北京大学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重译《论语》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论语》在西方世界也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使普通的西方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儒家学说,以此来改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因此,许渊冲教授常常采用意译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同时,为了使西方读者理解《论语》原文的意义和风格,他多选用通俗平实的语言。例如:

(5)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3]

“If a man is not good”, said the Master, “what

is the use for him to perform the rites? If a man is not good, what is the use for him to perform music?"^[10]

在许渊冲的译本中,我们能发现他的翻译不仅关注了孔子的思想,也注意到了原文的形式和文学韵律。译文没有完全照搬原文的句法结构,而是采用异化和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对目标读者而言显得更加自然。尽管他对原文的格式进行了一些改变,意思却没有丢失。作为一个译者,他成功地把语言中的文化模因传播到了英语世界。

四、结论

自第一个《论语》英译文本于1809年问世以来,200多年间共出现了50多个译本。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论语》英译实质上是把儒学模因传播到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是一个长期的文化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模因在不同时期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英语文化世界的宿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对以上四类译者的译文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模因必须和西方文化中已有模因相融合,才能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得以更好地生存,从而将其文化特征传播出去。《论语》的翻译和传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译者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动机,儒学模因也通过变异不断适应着动态的文化环境。通过对四类译本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论语》的翻

译策略已经从以归化为主渐渐过渡到以异化为主,儒学模因的特点在未来会完整地呈现在全世界读者的眼前。

[参考文献]

- [1]杨静. 从模因论谈典籍的英译传播图式[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1, 5: 33 - 34.
- [2]杨静. 模因论视阈下的典籍英译研究——以《道德经》为例[J]. 广西社会科学, 2011, 4: 13 - 15.
- [3]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 146, 69, 161, 49.
- [4]James Legge. 1960.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1) [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20 - 221.
- [5]陈代波. 儒家命运观是消极宿命论吗[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 23 - 25.
- [6]William, Soothill.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145, 120.
- [7]孔子. 论语: 汉英对照[M]. 威利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 [8]王文倩. 从许译《论语》看许渊冲的翻译思想[J]. 英语广场, 2015, 4: 22 - 25.
- [9]Ku Hung - 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898. 211, 9.
- [10]许渊冲. 论语[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华书局, 2011.

[责任编辑: 邦显]